

## 古典新读何为？

刘小枫

近十年来，我们试图将“经典与解释”确立为汉语学界的一种学术样式，并逐渐从对西学经典的解释推进到对中国经典的解释。有识者皆能看出，这一学术样式并非我们的创新，而是古已有之，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学术传统自古便在“经典”与“解释”之间展开：孔子整理故书，删定六经，开出新气象；诸子在三代经典的织体中立言；汉魏以迄清季列代文士在六经织体中立言，其间虽六经地位有浮沉、内容有更迭，但中国学术终究没有脱离经一解格局，“经”的地位一脉相承，并未中断。古代有志气的学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刘知几，《史通·自叙》），以诠释经典而非个人创作为最高理想，即便看起来像是个人创作，其实也怀着解经说经孤诣——太史公作史，不就意在于“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吗？中国古学的精髓端在于历代经师、睿哲对六经的注解，倘若看不到自家的这一传统，必然会看不清中国学问的问题，热闹过好一阵的中国有无“哲学”的争论，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蔽闇。

或难者问，恢复一种故有学问传统，在已经后现代的当下还有意义吗？我们不是早已脱离任何经典，从“零度写作”开始走向“个体”和“存在”了吗？暂且不说六经已非“经”——做一个不依赖任何经典、独立存在的思想个体，如此后现代式选择不更好？德里达这样的大师如此认为，还可以理解，若我等中等之才的学人们全都如此认为，就大可悲了。如此选择基于一个极成问题的预设：我们的心智胜于古人的心智，我们的境界比古人更高，我们的眼界比古人看得更远，所以我们只需依靠自己的心智，无需古人的经典——康德、德里达一类高人可以这样自负，我们跟着他们这样，就是不要命的自负了。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尝言：启蒙就是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智，抛开他人的引导。这是康德对自己的启蒙，如果我们把这视为对我们的启蒙，我们就错把自己当成了康德，或以为自己可以学成康德。若研读一下西方古典作品，我们都会发现，现代人普遍追求个体自由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古典学问中，追求个体自由都是极少数高人（比如恩培多克勒或庄子）的事情，而非多数中才之辈（比如我们读书人）。让所有中才之辈也模仿极少数高人追求个人自由，是现代启蒙的误导，结果是让我等中才之辈被现代性绳索困缚，践行个人自由无异于被牢牢困缚在第二洞穴中。

读书人当跟从经典，这一原则之所以恒古不移，关键在于人性有高低之分：高妙之人亘古稀罕，绝大多数读书人不过中才之辈。对于我等中才之辈来说，受古代高人束缚恰是一种福分。在阅读和解释的过程中学习经典的伟大，我等中才之辈才能获得心性的提升——这才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由。经典作品带我们看到更高更美的东西，若是我们只固守于自己的浅薄，便注定无法到达那至美之境：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我们没有康德或德里达那样的天分和高智。说到底，“经典与解释”不仅是一种学问样式，更是我等中才之辈的生活方式，即在心性上自觉接受古代经典的引导。古代经典冲和温厚，把什么样的生活最好、什么样的政制最好一类根本问题隐含在寓意的叙说中，让我等中才得以触及，进而学会以成就共同体的高尚生活的方式成就自己的美好生活。因此，只要人性仍有才性之

分，“经典与解释”的重大意义就不会消解。

重开“经典与解释”这一学问方向，还与中国当下的文明命运休戚相关。由汉迄清，经学传统绵延不绝，其间虽有所谓儒释之争、汉宋之争，却始终不离六经要旨；与此相应，近两千年来，中国政制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始终保持极高恒定性，体现出不息的生命力，即便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最终也能内化于无形。经典是政制和生活方式的根基，只要根基稳靠，政制和生活方式的大厦必定岿然不动；根基一旦摇动，政制和生活方式必然随之涣散。晚清以降，中国学人面对的便是这种政教制度的大变局。西方现代文明以坚船利炮侵入中国古典文明对中国传统经典、政制、生活方式的正当性构成全面冲击，如何回应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成为晚清以来几代优秀学人最关心的问题。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中国文明的出路在哪里？对此中国学人曾有两种态度：放弃中国经典奠定的政教体制，被西方的自由民主启蒙，接受全盘同化；要么持守住自家文明传统，从中国经典中探寻化解西方现代启蒙的药方。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现代启蒙的主张压倒了持守自家文明传统的主张，自由民主启蒙成了“最好的”出路——这就是我们所承接的五四新文化传统的遗产。沿着这条路奋勇往前，走到今天，我们终于开始意识到，这条道路很可能是可怕的歧途。

由于我们一开始遭遇的是西方现代文明，我们一直、且迄今仍然把西方现代文明当作西方文明的整体，以为西方唯有德、赛两先生，根本不知还有西方古典文明。这种已经近乎学界常识的观念，恰恰是西方现代历史主义教育的结果：历史在发展进步，因此，现代自然胜于古代，古典文明不过是文明史上的幼稚阶段。在唯现代西方马首是瞻的同时，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历史主义的哲学假定。从这一假定来看待自家的古典文明，我们必定会认为，中国的古典文明也不过是文明史上的幼稚阶段，不具有亘古不移的意义，只能沦为“国故”。由于一味追随西方现代主义，缺少对作为现代西方标志的技术理性和自由民主的反思，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跟随西方现代主义步入道德困境的深渊。中才之人是文明制度的基础，一旦这一阶层被败坏，文明制度一定败坏。我等中才之人盲目追随西方现代主义，必然把我们的文明传统拖进西方的中才之人搅起的现代性漩涡。因此，在当下要持守住中国文明传统，必须从理解西方现代性问题入手，并由此反观古典西方与现代西方的巨大差异。有了如此洞识，我们或许才能摸到回归自家经典的道路——“回归”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做到的，它要求我们首先破除现代意识加予我们的各种先见。

认识不清西方文明的全貌以及西方现代性的根源，也就无法正确看待中国古典文明的意义，更无法看清中国文明未来的走向。因此，虽然我们百年来都在认识西方，但眼下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重新认识西方，即重新认识我们非常陌生的西方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当然，正如西方的一些学人在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下返归古典传统，我们重新认识西方古典文明，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现代性问题，因为西方文明经历了从古典到现代的断裂，在古今对照中，我们才能看到西方古典文明的原貌以及现代文明的变异。换言之，认识西方古典文明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自我认识的过程，既能帮助我们廓除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的现代主义意识，也能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文明从古典到现代的断裂，并学会重新珍视中国古典文明传统。

如何才能认识西方古典文明？按照如今的文教体制和文史哲的学科划分，我们无从进入西方的古典文明。现代的学科划分是现代主义的发明，以现代的学科门类划分去探究古典文明，无异于以现代手术刀支解古典文明。古典学问不隶

属于任何一个现代的学科专业，因为古典学问的基础是历代圣贤写下的经典作品，既然是“经”，便不是普通的专业书本，而是为政制和生活方式奠立纲纪的“法”。因此，认识西方古典文明，只能通过悉心阅读、解释、注疏西方经典，由此深入到西方古典学问的脉络，探究西方政制与生活方式的沿革。如此种种，最终是为了更稳妥地回归中国古典文明，看清处在古典与现代断裂处的中国文明应当何去何从。说到底，把“经典与解释”确立为一种学问样式，绝非所谓复古，毋宁说，如此学问蕴含着的是对文明的关怀和抱负。